



Simone de Beauvoir



第四卷 · 清算已毕

西蒙·波娃回忆录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波娃回忆录
第四卷

清算已毕

陈际阳 高兴华 谭 健
王国宁 王 菲 温 冰
赵仁方 王荣华 辛四春
译

校译：陈际阳 谭 健

(苏)新登字007号

清算已毕——西蒙·波娃回忆录(四)

译者：陈际阳 高兴华等

校译：陈际阳 谭健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 插页 8

字数：447,000 199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44-9/I·327

定 价：11.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国总统密特朗
会见西蒙·波娃。



1963年，赫鲁晓夫
在其别墅内会见萨
特与西蒙·波娃。
(前排左二)。



1967年，埃及总统纳
赛尔会见西蒙·波娃





1974年：与养女一起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节。



1970年，与萨特一起上街叫卖“人民事业报”。



1967年，与萨特在罗素法庭上。



1972年，接受德国妇女活动家阿莉塞·施瓦策尔的采访。



1972年，与萨特接受电影采访。



1974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



晚年在自己的寓所里

前 言

当我的《老年》^①一书问世以后，有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指责我的这部书与我自己的老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联系。在我看来，这种好奇心大多由同类相残之性引起，而不是出于任何真正的兴趣。尽管如此，它依然能敦促我继续撰写我的自传，并最后完成它。来日越是不多，我就越是想见识见识这个怪东西——一种生活而且是一种从整体上透视的生活：这也是我在本书的开头将要尽力论述的。而且，自从我结束了我的上一部回忆录以后，悠悠十年已过，又有了许多要说的事情。

在我的前几部书中，我遵循的是编年体的写作顺序。据我所知，这种方法有其弊端。读者总有一种感觉，即除了能读到一些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花絮——一系列的前言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的东西，核心的问题好像总是藏在什么遥远的地方。一页接一页地阅读，希望能抵达这个地方，但毫无希望，最后读完全书也未能获得一个完满的结果。形诸文字，我的叙述将我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有限的现实，然而这并不是有一种有限的现实。与此同时，文字将有限的现实四处播散、割裂后使之成为一连串固定的明晰的时刻；然而事实上，过去、

① 《老年》(Old Age)，西蒙·波娃一九七〇年出版的散文。

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不可摆脱地牢牢交织在一起。我也许可以写道：“我准备去美国。”但是，这种暂住计划的后果及其以后的前景现在已石沉大海，消失在我的身后，正如一个再也没有可能性的计划销声匿迹一样。同样，在我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还没到达时，它总使当时的我心中充满疑问、神往——譬如说，小时候的我急于了解我成年后会怎么样，战前的我想知道战后的我是什么样子。依时间顺序，我无力传达这些相互联系和呼应，因此我也不能还我过去的岁月以其三维本来面目：它们被生活驱赶，缺乏生机，隔绝于它们的前因后果之外，沦为永无止境的平面的现在。

然而，我别无选择。对我来说，生活是一种具有明确方向的事业，在叙述我自己时，我也只有遵循它的进程。今天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显然，我不会因为自我重复而受到谴责：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世界一直在前进，我也有了新的经历。但是，无论是公共事件，还是个人事件，都未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立场，我没有被改变。此外，虽然有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计划和方案，但这些计划和方案却再也不能形成一种单一的、明确决定的意向。我也不再感到我在向一个有目标的方向前进，而只是感到我在不可避免地滑向我的坟墓。所以，现在我不必把岁月的行程作为指南；在某种程度上，我将依照这个行程的顺序，但是我是围绕着某些特定的话题来整理我的回忆录的。

第一章

每天早晨，在我睁开双眼以前，我就知道我是躺在自己的卧室里，自己的床上。但是如果我午饭后在工作室睡熟的话，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有时会带着孩童般的惊奇——我为什么会是自己？正如同一个儿童明了了自己的身分时感到讶异一样，令我惊诧的是，我发现自己在此地此时，在这个生活而不是其他生活中。是什么机遇导致了这种现状？如果从外表观察，我的出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那特定的生育密码及由此表示的我的双亲的结合，和在这以前他们的出生及他们祖先的出生，其概率不足亿分之一。是机遇，现代科学尚无法预测的机遇，使我生为女人。从这一点出发，我过去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有可能导致一百种不同的将来：我可能因为生病而辍学；我可能不会遇见萨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被抛到这个世界上，在它的规律和偶然性下生活，被别的而非我自己的意愿所统治，被环境和历史所统治：因此我感到我本身就是一个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时使我震惊的是，我不是一个偶然。倘使我没有出生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我必须把我存在着这个事实作为我的出发点。诚然，我过去所成为的那个女人的将来会使我变成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另一种女人追问自己她是谁。对于说“我在这里”的人，没有其他共同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主

体的必然巧合和他的历史并不足以消除我的疑惑。我的生命：它既非常熟悉又显得遥远；它既定义了我，我又能置身其外。那么，这使人好奇的客体究竟是什么？

如同爱因斯坦的宇宙，它既广阔无垠又有穷有限。广阔无垠，是指通过时间和空间，它能追溯到世界的起源和它最遥远的边际。在我的存在中我体现了人间的遗传特征和目前世界的状态。每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都知道，要使他的主人翁为人所知和为人理解，他必须首先涉及主人翁所处的时期、文明和社会；他必须探幽索隐，尽可能追溯到主人翁的祖先。然而即使如此，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同每个存在的个体与总体的关系的无穷的复杂性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而且用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有不同的意义。“我生在巴黎”这句话，对巴黎人、对其他省份的人和外国人，意思不尽相同。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数以百万计的与巴黎有着不同关系的个人当中，其简单性消失得无影无踪。

生命也是一个有限的现实。它拥有内核，一个情感的中心，一个经久不变的自我。生命存在于某段特定的时间里；它有开始也有终结；它在特定的空间里逐渐发展，它总保留着相同的根源，编织着无法改变的过去——其通往将来的道路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像把握和界定某个物体一样去把握和界定生命，因为生命是一个“未经累加的整体”，用萨特的话来说，是“分计的总和”，因此它没有存在。但是对它可以提出某些问题。生命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多少由环境所造成，多少由于必然，多少由于机遇，多少由于主体的自我选择和个人意愿？

帮助我思考我自己的是我已经讲述过的事实。“讲吧，哦，讲吧！”罗比-格里耶的一位主人翁说。那就讲吧：讲出来的诚然只是一则在平面上展开的故事，而不是某个人所经历过

的有关体验的故事；但是这则故事还得依靠体验而存在，还能突出某些主要角色。虽然体验暗示着无穷，但它用某个数目的单词表示出来——这些单词是可数的，如果某人愿意的话；不过这些单词涉及到理解，这本身也包涵着无穷。我写“我生在巴黎”时，我所面对的读者无需我在世界历史上或者地图上确定巴黎的位置，就能理解这句话。但反对者认为“讲”为表达真实体验的易变的模糊性的书写词语套上了牢固的轮廓。但事实上由词语所唤出的形象是不固定和不准确的；由词语所转达的理念并没有精确地界定。无论如何我不打算带领读者穿行于能使我的过去栩栩如生的醒着的梦幻，而是从某些特定的概念和思想的立场去审视我的历史。

机遇的概念是我的主要思路之一。对我来说，它有着独特的意义。回顾过去，我不知道那些我本有可能选择但事实上未曾选择的道路会把我带向何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我不该指望它有任何改变。因而我把那些帮助我实现命运的因素看成是一个个幸运的机遇。

很明显，首先是我的出生。如我前文所言，纠缠于把我抛进这个世界的一系列的偶然是毫无意义的。我从这里开始：我生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是乔治和弗朗索瓦兹·德·波娃的女儿。置身其外地看，这个事实（由于它的独一无二的特性而使我折服）十分普通。她二十岁，他三十岁时结了婚，一年以后有了个孩子，这两个年轻的资产阶级适应了他们生活着的、他们当时的那个特定世界的习俗。在孩子的状态会是什么以前，这些就已规定好了——法国人，资产阶级，天主教徒，唯有性别尚未知晓。从我父母生活的优裕条件来看，我不会夭折并能有幸得到健康的身体。在我面前展现出清楚地界定了的将来——细心的照料；一个有一些近亲和少量远亲的家庭；一位保姆，路易丝；巴黎的一套房子；在利穆赞

的乡间住所；以及几乎可以肯定的第二个孩子的到来。

自一开始，我的出生就使我成为一个享有社会特权的孩子，与农民或工人家庭的女儿相比，我能得到多得多的机会。另一个我不能很确切地描绘的是我童年早期的发展道路。

如今所有的儿科医生都强调出生后的头两年对个性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到八个月的时候，婴儿的眼泪和哭泣通常是与周围的一切进行交流的一种方法；婴儿开始意识到它们的效果并用它们作为示意；于是就与成人之间形成了相互的关系。但当婴儿不受爱怜，被搁置一旁或者遭到感情伤害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形成。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婴儿不中途夭折，他会成为孤独的或精神分裂的孩子。轻一点说，冷漠、忽视和缺少刺激所造成的不安定感会使婴儿性格内向。萨特在谈到福楼拜时，描述了一个照顾和哺养得很好、但没有得到充满爱意的慈祥的对待，以至于没有与他人建立任何对话的孩子，如何形成了一种被动的性格。很明显，我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断奶的，或者人们是如何教我清洁的，或者我是如何对这些教育作出反应的。但我母亲年轻活泼，她为顺利地生下第一个孩子感到骄傲。她与我有着热情而爱昵的关系。在我摇篮周围是一个充满关心的大家庭。我信心十足地窥视世界：成年人微笑着顺从我一时的念头，这使我相信我对他们所具有的力量。我的多血质的天性鼓励这种对别人的苛求，这种性格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总是坚持把我的意愿、拒绝、行为和思想贯彻到底。除非一个人指望从别人或自己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否则，他就不会坚持；如果一个人不需要它，就永远得不到。我非常感激我生命的最初几年给予了我这种过渡的精神状态。当我受到挫折，我会由于暴怒而颤抖；这些暴怒来自何处？我在回忆录中未能令人满意地作出解释，同样我现在也无法做得

更好。但我仍然认为暴怒对我有好处。我的起步是正确的。诚然，这本身并不够，生命不是原来种子的单纯生长。它不断遇到危险，或是受阻，或是受伤，或是遭到破坏，或被改变方向。然而，一个幸福的开头确能鼓舞一个主体从环境中获得最好的部分；如果开头不幸福，就会出现恶性循环——主体白白放过了机会，在拒绝、孤独和阴郁中，他把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窗户关闭了。

把我的命运与我妹妹的作一个比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她的道路比我的要艰辛得多，因为她不得不战胜童年的缺陷。在我两岁半拍摄的照片上，我的表情坚定而且自信；她在同样年龄的照片上却显得惊惶胆怯。作为小女儿，与姐姐相比她不那么令人惊奇，也不那么讨人喜爱；我的父母也因为她不是个男孩而感到可惜。她一定比我少见些微笑，少受人注意。她小时候易于受惊，甚至总是忧心忡忡；他们说，她比我更“动感情”——她需要得到安慰。有人讲她脾气犟，这使她非常生气；她常无缘无故地大哭大叫。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彻底地告别童年。

我的童年生活则平静而愉快。父母亲虽然经常吵架，但两人关系和谐，这使我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获得的安全感有增无减。而且，一般而言，我从旁人那里获知的自己的形象同自己内心对自身的了解两者之间没有多少抵触。

小孩乃是被异化的生命。他从成人那里领受他的存在所置身的世界、时间和空间，甚至还有他使用的语言。由于事物有着半神半人的属性，因此，对孩子们来说，它们不仅是工具，而且是具有神秘深度的隐而不现的实体的符号。童年的“奇异”就存在于此。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把童年美化得富有诗意，他们是在胡说八道。小孩身上不存在什么诗意，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世界的不可思议确实能使他着迷——

这里的条件是：他有足够的条件能凝视和探索这个世界。

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他从别人那里领受自己的形象，甚至领受自己的存在本身；他把这视为本质所在，而把自己视为非本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他把自己树立为主体。这样，他站在一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世界上，他以成人的眼光把自己视为一个相对的存在。他把自己理解为某种看得见的存在。他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现这种身分。

有些孩子也许根本无童年可言。一位五岁的擦皮鞋的孩子，他与顾客的关系乃是工人与雇主的关系，而非孩子与成人的关系。即使他把收入交给父母，在实际挥动皮鞋刷子的时候，他认识自我的途径也是直接的活动，而不靠任何局外人作中介。也有些孩子，特别是出身于家境贫困的大家庭里的孩子，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因而根本无法取得自我意识。像在印度等地出现的一些极端情形中，孩子会变成返回自然状态的野人。一个遭人横眉冷对、无情统治、剥削、恐吓的小孩，不可能完成一个反省过程，以此逐渐意识自我。不过，我以前已讲过，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孩子在同时经历了异化和自律。即使是被极度异化的孩子也认为自己在根本上是必定的，也会在一瞬间把自己视为自知的存在。如果他的角色在他看来是令人满意的，他会急切地适应它；他扮演着一个角色，逐渐成为一名模仿者。在《言词》中，萨特描述了自己的“戏剧表演”（“我的本质、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名字完全由成人们支配；我通过他们的眼睛学会观察自身”）。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发现，在他们为他作的装扮之外，他还是有一个实体：他发现了 he 自身存在的赤裸裸的真相，这真相只为他一个人所感受；对镜而坐，他的脸由于迷茫和苦恼而变形了。他在阅读和写作——独立的活动——中找到了拯救之道。其他人，如我妹妹和青年福楼拜，发现自己被讨

厌的自我形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是忍气吞声，就是奋起抗争。在恼怒和发怒之间，可能有许多中间物。维奥莱特·勒迪克小时候老是生病，她感到自己是母亲的一个包袱，一个实实在在的耻辱；她相信自己有罪。在这方面，我的遭遇也算异乎一般。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而别人却当我是小孩，我会大发雷霆；但在一般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角色心满意足。大约七岁时，我不再动辄发脾气了，我驯顺地充当一位乖巧的小女孩。但正在那段时间，越来越多的活动允许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发挥才能。

在幼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由，我的自由也成了我与父母之间、我与路易丝之间感情的依托。不过，在我当时看来，这些感情十分自然，好像纯粹是必定的，而表达这些感情的行为是用以哄骗我的；这些行为是对所要求的和所期待的一切的反应。这个时期，唯有一桩自由地创立起来的关系，那即是我和妹妹的关系。依照我父母追求的家庭模式，他们应该很快再生一个孩子；在机遇的作用下（孩子的性别取决于父亲的精子，精子有两种；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形中，究竟哪一种类型的精子使卵子受孕，完全是机遇），这个孩子是个女孩。对我来说，假如这是个男孩，情况是否会不一样呢？这一点我说不清。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确，我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变坏。我相信，我有一个年纪相差不大的妹妹是我的运气。她帮助我表现自我。我集权威和爱意于一体，这也成为我与妹妹间关系的标志。是我自告奋勇教她读书、写字、数数。是我发明我们做的游戏，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我对她抱有这种态度，取决于我是这样一个小孩：心情愉快、善于适应环境，自信，开朗；没有任何因素使我无法发自心底地欢迎一个妹妹，我对她不存有任何嫉妒之心。我好动、霸道，渴望通过什么有效的手段摆脱

作为一个孩子所具有的被动性；她给我提供了最好不过的机会。不过，我依然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我与妹妹的关系是由我创立的，这是因为，尽管成人们引导我对他们作出种种举动，但在起初，妹妹对我一无所求，我开始与她接触时，也没有预先确定什么模式——我只是在我本能的冲动后面亦步亦趋。

在其他方面，我的自由在于接受已经为我确定的命运，并且是愉快地、甚至是狂热地接受它。我的恭顺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样，在德西尔学校，我很快成了尖子学生。在我父母差不多沦为一文不名的穷人以后，他们更看重文化价值，而不再重视我的父亲在其他情况下会非常热心的“摆阔性开销”。他们让我读书，这项不必花多少钱的活动成了我最主要的娱乐。我痴迷地埋头书中。我爱我父亲，而我父亲爱书，他当初曾使母亲对书产生宗教般的敬意。从我记事时起，我的好奇心就特别强烈，而且一直没有消退；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的好奇心从何而来？弗洛伊德坚持说，它植根于性本能。但在我看来，我对“不合适的事物”所抱的兴趣更应该是我求知欲的衍生物；我把它视为我的一个基本点。

试图对这一点作出解释，或许没有什么意义。每个小孩都具有探索世界的天性。问题应当这样提出：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天性会丧失？我发现这样一些原因：身体虚弱，迟钝，得不到关心也即得不到激励，墨守成规，过于孤独，被迫过早地对事物感到懈怠，焦虑和形形色色的着魔，以及情感失去平衡。一个难以适应环境的孩子把心思过多地用在自己身上，因而无法面向外部世界。我妹妹天性开朗，但她的求知欲不如我强烈。扎扎活泼、聪明，但她与家庭的关系，她的早恋以及随后对它们的怀念，使她无法如我一般自由、超脱。直到十一二岁，我实际上没有遇到一桩疑难问题，我因